

香港之中國近代史研究——以學會為個案

李金強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香港一地，自 1841 年後，在英國殖民統治下，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然居民以華人為主，形成中英雙語的社會及文化，遂逐漸衍生出英語及華文史學自成一格。香港之中國近代史研究，早有學者撰文探究，乃以本地專上學院之學者及其著述為對象。（註 1）然而香港開埠以來，官方及民間知識分子相繼組織學會，此起彼落。其中自 1892 年輔仁文社成立後，相繼出現不少關心中國與香港研究的「史學性」學會。此等學會的成員主要來自政府官員、大學教師及專業人士，均為對中國及香港之近代歷史具有興趣及學有專精者，相繼出版學報、通訊、專書，並舉辦研討會、演講會、論壇，因而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推動者。故探討香港之中國近代史研究，香港此類學會的出版及活動，不容忽略，故本文即由此入手。

一、發軔

就香港之中國近代史研究而言，始於 19 世紀下半葉。早於 1894 年輔仁文社成員陳鏗助發表《香港雜記》一書，該書乃陳氏「涉獵西文」，收集中英文資料，記述香港史地及政治、經濟、社會、教育之現況，為 19 世紀下半葉首見具有近代史類之香港史專著。（註 2）較之英國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歐德理（Emst J. Eitel, 1838-1908）以英文撰寫的香港史——*Europ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London, 1895) 為早。就此而論，香港雖受英人管治，然英國史學在香港本土未見彰顯，祇有英治時期，香港殖民地官僚與本地學者所組成之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從事以英語為主的香港及中國史研究。該會於 1847 年成立，1859 年停辦，及至 1959 年復會，乃承襲英國倫敦創立的皇家亞洲學會而來。復會後由香港大學（港大）中文系系主任林仰山（Frederick S. Drake）教授出任會長。林仰山出生山東，畢業於倫敦大學，曾任教齊魯大學，專治神學與地理及東方學等。該會以中國、亞洲歷史文化為研究對象，尤重香港史之研究，英文學術期刊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至今出版 53 期。近年並與香港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不少英文專著，（註3）成為本地以英文研究香港史及中國近代史的學界代表。

然自 30 年代以降，由於五四名學者胡適（1891-1962）於 1935 年南下，接受香港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期間提出宜改善本地的中文教學，並期許香港成為「南方新文化的中心」。故推薦任教燕京大學的許地山（1893-1941）出任港大中文系教授，繼而又聘名史家陳寅恪（1890-1969）至該校任教，首開香港華文史學研究的先聲。許地山在港期間，不但對港大中文系進行改革，劃分為文、史、哲三組，促成香港人文學科教學與研究的「現代化」。（註4）進而發表書

文，編刊《達衷集》（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史料）及發表香港史地著述，實為其時本地華文學界關注中國近代史及香港史研究之始起。與此同時，由於抗戰、內戰（1937-1949）的政治變動，左派史家包括郭沫若、胡繩、黎澍，翦伯贊、侯外廬，相繼留寓香港，其中胡繩之《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黎澍之《辛亥革命與袁世凱》兩本近代史名著，皆於香港撰寫及出版。（註5）

二、開展

及至 1949 年中共政權成立，史家相繼南移香江。時錢穆（1895-1990）創辦新亞書院及研究所，日後成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的成員；而羅香林（1906-1978）則執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此外尚有左舜生、李璜、簡又文、黃福鑾、司馬長風等近代史學者，分別任教本港公、私立大專院校。民國史學由是南移香江，遂為香港華文史學奠下基石。其時尤以秦漢至明清的古史研究最為突出，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出版亦見萌生。（註6）最著者為羅香林啟動香港史、近代中國歷史人物，以及近代中國基督史三項專史的研究；左舜生、李璜、司馬長風、黃福鑾等先後撰寫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及相關論題；簡又文研究太平天國史，從而開拓了本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方向。（註7）而香港新一代史家即在錢、羅二人及上述南移之國內近代史家之培訓及影響下，兼且受教於來

港任教的臺灣及旅美、旅英、旅澳華裔史家，前者如牟潤孫、嚴耕望、全漢昇、李定一、王德昭、王爾敏等，後者如余英時、謝文孫、蕭作樑、薛君度、王賡武等，逐漸成長。而對中國近代史研究最為關注，下開80年代香港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勃興。其中最值得注意者為1985年，本土年青的史學教研工作者，組成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成為上繼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開展了以華文為主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該會成員大多在本港土生土長，並於港大、中大、浸會大學（浸大）及其它院校畢業，繼而至英、美、法、德、澳洲及日本等地深造，其史學技藝遂得以中西結合，而大部份以研究中國近代史為主。（註8）此後，在歷任會長包括陳善偉（中大）、楊意龍（1949-1996）（浸大）、周佳榮（浸大）、蘇維初（香港公開大學）、梁元生（中大）、李金強（浸大）、黃嫣梨（浸大）、林啟彥（浸大）、麥勁生（浸大）、丁新豹（香港歷史博物館）等推動下，先後出版《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合共10期）、《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合共5期）、專刊（合共4冊）、召開講座、研討會，遂使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成為香港史學界研究的主流。其中該會所推動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課題，包括近代中國歷史人物研究如王韜、嚴復、丁日昌、孫中山等；事件如鴉片戰爭、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專題如近代中國留學生、近代中國海防史等，相繼出版專書。其

中辛亥革命九十及一百週年，先後召開研討會，出版《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2005年）（二冊）及《共和維新——辛亥革命百年紀念論文集》（香港城市大學，2013年），而近代中國海防史亦召開三屆，出版兩冊論文集。此外該會並先後出版《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及《當代香港史學研究》（香港三聯書店，1994年），總結其時香港之華文史學及中國近代史研究，並透露其發展方向，殊堪注意。（註9）

三、轉向

此後，研究群體相繼出現，透露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轉向，此即重點集中於近代社會文化史專題研究。1997年香港科技大學成立華南研究資料中心出版《華南研究中心通訊》，現已出版80期，此乃與中山大學歷史系及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等合作刊物。該中心崇尚以人類學治史，透過組織田野考察，舉辦學術會議，徵集、收藏及編輯各類官私檔案文獻，推動中國及華南地區的歷史文化及社會經濟變遷的研究。（註10）該中心源起於華南研究會，該會成員，以香港地方文獻、碑銘收集計畫為始，並經中文大學歷史系科大衛（David Faure），人類學系陳其南及美國耶魯大學蕭鳳霞三人策動華南地域社會和國家意識型態比較研究計

劃。又獲廣州中山大學陳春聲、劉志偉等加入，漸具規模。至 1996 年由科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院長丁邦新建議，在該校成立研究中心。其中主其事者如蔡志祥、程美寶等，多為科大衛之學生，並與中山大學歷史系陳春聲等合作，透過田野考查，「找廟讀碑」，以社區之宗教與文化入手，探查明清以降華南地區的社會與文化之演變，研究隊伍日漸擴大，著作出版日多，從而被學界命名為「華南學派」。(註 11)

踏入 21 世紀，香港專上院校及神學院師生於 2004 年組成中國基督教史學會，推動中國教會史研究，結合神學與歷史，另闢蹊徑。香港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始於羅香林、簡又文及施其樂 (Carl T. Smith, 1918-2008) 三人。羅氏早年研究唐元基督教史，繼而以中西文化交流視角，研究近代中國基督教傳教士及著名華人信徒；而簡又文則對太平天國基督教、近代中國基督教開山事業進行研究；而施其樂則研究香港華人信徒精英與香港教會及社會之關係，由是使本港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遂由前此以通史及斷代史專題，轉入關注近代基督教入華史的探究。此後中文大學之梁元生、吳梓明、盧龍光、邢福增，浸會大學之費樂仁 (Lauren Pfister)、黃文江、朱益宜及本人，建道神學院之梁家麟、劉義章等相繼參與推動此一專史相關課題之研究，終於促成中國基督教史學會的誕生。該會創立之宗旨，在於聯繫香港及海內外從事中國基督教史的學者，並透

過學術講座、研討會及出版刊物，推動此一專史的研究。先後參與協辦「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討會」(由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建道神學院合辦)，並出版 4 本研討會論文集。(註 12) 其中以浸會大學歷史系出版《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為此一專史研究的代表刊物，其範圍仍以近代、現代史為主，現已出版 9 期，成為本地中國近代史研究之新方向。

四、結語

上述香港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華南研究中心及中國基督教史學會，分別代表香港中國近代史研究不同時期的發展方向，成果最多。然而隨着全球化的時代趨勢以及後現代史學思潮的影響，香港的史學教育及研究亦出現丕變。其中最具代表者，莫如 1998 年中文大學歷史系課程的改革。此即將傳統史學教育之課程，由注重通史、斷代史、專史，改易為以國別／地區史、比較史及公共歷史三大範疇，從而納入華南族群史、移民史、中西法律、戰略比較、飲食文化史、企業史、性別史、方言族群史、婦女史等史學專題之新元素。其次，由於強調全球化，講授課程及研究著述，亦增加及重視以英語為主導，而其它院校歷史系亦大抵如此。(註 13) 而香港之中國近代史研究亦由是一變，踏入 21 世紀，香港年輕一代的中國近代史學者，亦漸

多以英語發表，而其研究亦跳脫出前此以政治、外交、人物、思想為主要的研究方向，逐漸增多了性別史、區域史、方言族群史、宗教文化史、法律史等的新研究方向。也許從1959年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復會，1985年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的成立，以至1997年華南研究中心及2004年中國基督教學會之成立，正好代表了香港自1842年開埠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不同階段的重要轉向。此亦本文以學會為個案，進行探究之要義所在。

【註釋】

1. 林啟彥，〈戰後香港地區的中國近代史教研成果〉，《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頁1-20。
2. 陳鏞勳撰，莫世祥校註，〈自序〉，《香港雜記》（1895）（廣州：暨南大學出版，1996年），頁3；楊國雄，《香港身世文字本拚圖》（香港：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2009年），頁12-13。
3. www.royalasiaticsociety.org.hk，2014年5月12日採用，見「home」及「publications」；羅香林，〈香港大學中文系之發展〉，《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年），頁249-250，註20。
4. 胡適，〈南遊雜憶〉，收入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41）》（香港：華風書局，1983年），頁57-60；又參羅香林：〈香港大學中文系之發展〉，頁230-238。
5. 胡，〈序言〉，《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唐振常，〈黎澍學述〉，《黎澍十年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69-70。

- 黎澍一書，1954年易名為《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政治》重版。左雙文，〈近代史家和20世紀三四十年代香港史學〉，《史學史研究》，第1期（2004年），頁47-50；王盛，《許地山評傳》（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頁93-95；許地山，〈香港小史〉，黎晉偉主編，《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編譯出版社，1948年），頁33-34；許地山，〈香港與九龍租借史地探略〉，《廣東文物》（1937）（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重印），中冊，頁418-429。
6. 1949年後香港之古代史研究，參周佳榮等編，《當代香港史學研究》（香港：三聯書店，1996年）一書。
 7. 林啟彥，〈戰後香港地區的中國近代史教研成果〉，《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頁17-20；李金強，〈當代香港華文史學之興起——以羅香林為個案〉，《書生報國——中國近代變革思想之源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65-171。
 8. 李金強，〈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起承轉合〉，《世變中的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
 9. 劉健明，〈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的學術活動與出版〉，《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頁149-154；林啟彥：〈香港中國近代史研究概況——以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活動為中心〉，《當代中國研究聯刊》，第5期（2014年），頁4-5。
 10. 見《華南研究中心》網頁：schina.ust.hk。
 11. 蔡志祥：〈華南研究通訊與歷史人類學〉，《中華文史網》，網址：www.historychina.net/wgrkzg/362837.shtml（2014/5/12點閱）。並參周建新，〈歷史人類學在中國的論爭與實踐——以華南研究為例〉，《內蒙古社會科學》，第27卷3期（2006年），頁83-85。
 12. 李金強，〈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之興起及其發展〉，《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創刊

號（1998年），頁13-18；〈第六屆近代基督教史研討會會議綜述〉，李金強、劉義章主編，《烈火中的洗禮——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教會1937-1945》（香港：建道神學院，2011年），頁576-578；並見中國基督教史學會網頁：cscrc.org/link_tc.php（2014/5/13點閱）。施其樂牧師的生平及其學術貢獻，參李家駒、

黃文江，〈施其樂牧師：傳教士成為歷史學者〉，《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第6期（1993年），頁91-97。

13. 郭少棠，〈文化的衝擊與超越：當代香港史學〉，《歷史研究》，第1期（2003年），頁124-125。

新書 預告

吉星文將軍日記

揭開八年抗日戰爭的序幕
打響盧溝橋事件的第一槍
八二三砲戰中殉職的副司令官
抗戰名將吉星文一生所走過的戰爭
歲月盡現於此

（預定 104 年 7 月出版）

胡宗南將軍日記

從第一軍軍長到第一戰區司令長官
蔣中正嫡系軍隊的第一將領
抗戰與反共並重
中國戰場上的中流砥柱